

毛主席教我学文化

罗斌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毛主席教我学文化

罗 斌

邓泰和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375 字数 20,000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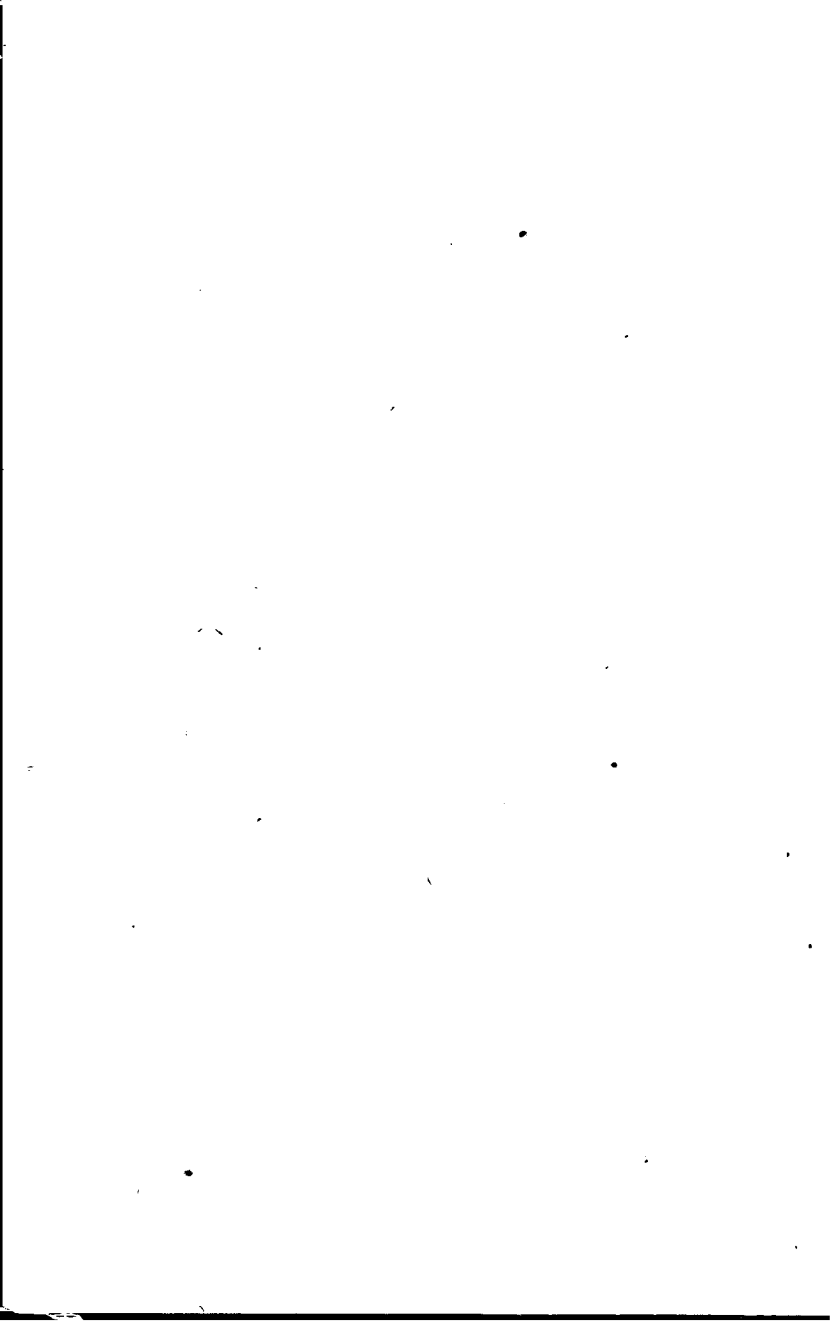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602 定价: 0.11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老红军战士罗斌同志写的回忆录。

罗斌同志刚参加革命时，由于没有文化，工作常出差错，他很苦恼。当时是战争年代，各方面的条件很差，要想学习很困难，就连笔和纸也很难搞到。但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，他千方百计地刻苦学习：看到不识的字，就请人教；稍有空闲，就用削尖的竹笔在地上学写字。经过长期的努力，他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，思想觉悟也有很大的提高。这使他能更好地为革命工作。

少年朋友们，罗斌同志能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坚持刻苦学习。现在学习的环境这么好，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。



在雄伟井冈山的七溪岭下，有一条奔腾不息的禾水河。河的西北面，座落着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名字叫白口村。这里，泉水终年清澈透底，松柏四季常青，一片片密密的竹林子苍翠欲滴，特别惹人喜爱。但是，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这里，山不是穷人的山，水不是穷人的水。青山埋着的是穷人的白骨，河里淌着的是穷人的血泪。

我出生那一年，虽然经过辛亥革命，但农民的脖子上仍然套着沉重的枷锁。我爷爷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终年早起晚睡，积劳成疾，含愤死去。我父亲接过爷爷遗留下来的扁担、柴刀，靠着不到两亩的薄地，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。全家五口人，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过的仍然是破棉袄裹不住身本、糠菜填不饱肚子的生活。

我一年年长大，除了跟着父亲下地，上山砍柴，还到地主家去放牛割草、拾粪、做零活。在村里，我看到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，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心里十分

羡慕。

我七岁那年，一天在村背后北坪的竹山上放牛，听到了学堂里的读书声。我把牛赶到山坡上，然后躲在学堂一个窗户外面，听里头的先生给学生讲什么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，“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”。

我听着听着，突然，有一个小崽子叫了声：

“哼，为啥这样臭？”

被他这一闹，教室里乱哄哄的，搅成了一锅粥。原来，他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。这帮有钱的小崽子，看到我站在窗户外也想听课，便蜂拥而出。有的脱下鞋子打我，有的恶狠狠地骂着：

“阎王老子让你变猪变狗，你偷了个人脑壳。生来就是摸牛屁股的，还想读书识字？快滚开！”

我气愤地抓起一把土，往这帮小崽子的脸上一撒，拔腿就跑。

那个骂我的小崽子想追我，可他胖得象个冬瓜，跑了几步，就呼哧呼哧直喘气，根本追不上我。

我回到山腰上，拿起放牛鞭子狠狠地一抽：

“总有一天我会读书识字，不会受你们这些小崽子欺负的。”

事后，我有点害怕，巴不得早点回家去，可是日头好象被竹竿撑住了一样，老是不下山，好不容易熬到傍

晚，我才回到家里。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父亲，可是父亲已经知道了。他没有责备我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把牛看好，不要出去闯祸。”

我父亲淳朴忠厚，安分守己，从来没有和穷苦的乡邻们撕破过脸皮。对我们兄弟姐妹，他特别喜爱，开口“儿”，闭口“仔”。他一再叮咛我要老实，不要招惹是非。

我总看见父亲一年到头在忙。天一亮就下地劳动，或者上山砍柴割草；晚上也没歇息的时候，在昏沉沉的象黄豆般的油灯下编织草鞋，编呀织呀，常常通宵达旦。编好的草鞋，可以拿到街上去卖。

就在这一年的除夕，我们一家人围在锅台旁，盼望着父亲卖了柴草，从街上买回东西好过年。等了好半天，父亲回来了，他把扁担轻轻地放在门背后，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些过年敬菩萨用的香烛纸钱。然后，又从布袋里取出个小包包，放在手上掂了几下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小瓦罐子里。他把我叫到跟前，唤着我的小名说：

“源娃子，你不是想读书吗？”

我直楞楞地望着父亲，半晌，摇摇头说：

“家里没钱，上不起。”

父亲笑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第一次笑得那么轻松，那么惬意。接着他对我说：

“孩子，我们家是穷。你爷爷、你伯伯和我，还有你大哥、二姐都是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睁眼瞎子。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，我和你阿姆早合计好了，过了年就让你去竹山小学读书。”

说着，他望望母亲，又把那个小包包从瓦罐子里掏出来，轻轻地打开，里面露出一串黄澄澄的铜钱。父亲又说：

“喏，这几个钱是供你上学用的。”

这时我才明白，原来父亲上山砍柴割草，下煤窑挖



煤烧炭，晚上又在灯下编草鞋，把积攒的钱装进瓦罐子里，为我上学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。我既高兴，又难过，扑在父亲的怀里，咧着嘴笑着，可泪水也止不住淌了下来。

正月十五挂红灯，是上学堂的日子。这天一早，父亲帮我穿上母亲连夜为我洗干净的衣服，领着我去学堂念书了。

学堂设在白口村一座古老的“罗氏宗祠”的余庆堂里，门前蹲着一对龇牙咧嘴的石狮子。学堂分为前后两栋，中间有个大天井，天井因为潮湿，地上长满了毛茸茸的青苔，使人感到阴森可怕。

父亲带着我穿过学堂前的一个牌坊，来到一间小栋屋子。一进门，可以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屏风，然后，进了学堂右边的小房子。一个头戴古顶、身穿长衫的家伙见是有钱人家，便点头哈腰笑脸相迎，见了我父子俩，马上板起脸孔，阴阳怪气地说：

“噢，来这里有啥事？”

父亲嘴里叫着先生，把让我上学的事说了一遍。

那家伙狡猾地一笑，对我父亲说：

“你是本地人，不会不知道学堂的规矩，这进来的可都是披红着绿富道人家的金童玉女，象你这样的，鄙人虽想帮忙，就怕老板不答应！”



原来这个家伙是看管学堂的。

父亲拿出铜钱苦苦哀求他把我收下。不料这家伙瞥了一眼父亲手里的铜钱，勃然变了脸色说：

“你知趣点！有道是‘白马镶金鞍，骑出万人观；有钱人识字，识字人做官’。你那几个挑大粪的臭钱，就想来读书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

说完将门“砰”地一关，把我父子俩撵了出来！

那门前一对龇牙咧嘴的石狮子，显得更加凶恶，

也好象在撵我们，气得我向它们脸上吐去一口唾沫！

本来就有病的父亲象是被挨了一闷棍，回到家里，

一屁股坐在凳子上。他脸色铁青，颤抖的双手捧着那包积攒多年的铜钱，断断续续地重复着：

“白马镶金鞍”、“识字人做官”、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全身哆嗦起来。一会儿，“咚”的一声晕倒在地，手里的铜钱“哗”地撒在地上。

母亲和我立即上前去，抱起父亲。我看见地上这几个被父亲攥得又光又亮的铜钱，就好像看见父亲的滴滴血汗，不觉一阵心痛。我高声嚷着：

“阿爸！阿爸！你醒一醒，我不去读书了！不去了！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到了一九二七年。

这两年，象江西许多地方一样，我们白口村也闹起了革命。我们穷人不象过去那样怕地主老财。地主的狗腿子来收租逼债，农民敢当场把他的秤和算盘折断砸烂。穷娃子还可以随便到地主老财的牙床上去打滚。白口村变了样：耕田佬欢喜，有钱人恐惧。门道多的地主老财，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南昌。村里成立了农会，我也肩扛红缨枪，参加了儿童团。当时，我觉得在村里闹革命，比上学还痛快哩！

可是闹了一阵子，由于蒋介石叛变了革命，地主老财又回来了，党组织、农会、儿童团等，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。白口村又变成原来的样子；地主佬神气，耕田

佬受气。

过了不久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：有一支救穷人的革命军进山来了！村里的穷人奔走相告，个个扬眉吐气！看到田里的稻谷在点头笑；闻到山上的油茶花格外香。庙背官厅的铁树多少年不开的花也开花了！我也高高兴兴地在村里走来窜去，总想能从大人的口中得到一些更详细的可喜消息：这支队伍有多少人马？打了哪些胜仗？是谁领的头？是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，求解放的？

一天晚饭后，白口村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陌生人。他俩把村里的几个穷哥们和我们几个年岁稍大的穷娃子，叫在一起开会。一个姓杨的同志告诉我们：

“上山来的队伍有个毛委员。他为了解救穷苦大众，带了一支队伍从湖南打到江西。经过你们村西北的三湾已经到了井冈山。”

他又告诉我们：他俩是毛委员派来帮助白口村恢复和重建党小组、赤卫小队和儿童团的。

在他俩组织下，村里的许多群众组织都恢复了，我被选为村儿童团长。

我们儿童团员脖子上系着红绸子，胳膊上佩着红袖章，天天出操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、盘问来往行人，捕捉奸细、密探，神气得很。我们还配合红军，捉靖卫团、


打保安队、反“围剿”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毛委员亲自指挥了龙源口战斗，第三次解放了永新县城。战斗结束后，开了祝捷大会，当场处决了永新县最大的土豪兼保安团长肖家壁，为民除了大害，出了大气。会上，宣布成立县工会、县农会、县赤卫大队。革命越搞越红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越打越发展。当时根据地到处传颂着：毛委员上了井冈山，劳苦大众有靠山，山上来了毛委员，山上山下红一片。

革命形势发展很快，但是，有一件事使我很着急：没有文化。杨同志给我讲革命道理，我记不下；宣传口号，我不会写；送信送文件，我看不懂。大字标语贴在墙上，它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。多伤脑筋啊！

一次，为了造儿童团的花名册，还差点出了大事故。那时我想，干儿童团嘛，就是干革命，就要象大人那样去干。赤卫队有花名册，我这个儿童团长也得有一份。于是，我找到一张从土豪家里抄来的毛边纸，就开始写了。抓笔老半天，一个个小伙伴的模样在我脑子里活蹦乱跳，但他们的名字就是写不下来。我提笔如抓千斤锤，只得把姓龙的画条龙，叫狗的划一个钩，用记号来代替人的名字，半天没写上几个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
没办法，我只得找店铺记帐先生。我把来意向他



说了一遍，他很乐意，立即取出纸笔。我一边念名字，他一边写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他就把名字写好了。我说了一声“多谢”，就从店铺里跑出来。正巧，在路上碰见杨同志，我就高高兴兴地将造好的花名册送给他看。

杨同志一边看，一边微笑地点点头。突然，他抬起头来问我：

“这份花名册是你造的？”

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赶紧地回答：

“哪里，是叫村里一个店铺记帐先生写的。”

杨同志听后严肃地说：

“以后可不能随便叫人写这样的东西！”



接着他给我讲了花名册是党的机密，不但不能告诉别人，更不能丢掉，必要时还要上山把它埋起来。花名册一旦落到敌人的手中，花名册上的人可要卖人头的！

听了杨同志的话，我出了一身冷汗。心想：不识字多糟糕啊！从那时起，我就想学文化了。

可是，儿童团里净是穷娃子，都不识字，没有人教，又没课本，连纸笔都没有，每天工作又忙，也没有多少时间学习。这样，我学习的情绪热了几天，就又冷了下去。
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，永新县成立了赤卫大队。我被调到县赤卫大队部当了传令兵。一天，快吃午饭的时候，我在大队部发现一本写得密密麻麻、曲里拐弯折迭的本本。大队长进来后，我问：

“大队长，这是本啥东西？”

大队长看了看那本本说：

“这是地主老财家的帐本嘛。”

接着大队长严肃地对我说，明天有任务，要好好讲讲卫生，抓紧时间把衣服洗一洗，头剃一剃，不要光脚板，要穿新草鞋。

是什么任务这么重要啊？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猜开了：大队长很相信我，以前布置任务，从来没有提出过

这么多的要求，也没有这样严格过。是召集会议？没有告诉我布置会场，不象。去观察地形？没有嘱咐我带望远镜、指北针、地图，不象。下乡宣传？没有叫通知其他人，也不象。这一夜，我总觉得太长了，翻来覆去想呀，猜呀，怎么也猜不着。只听着禾水河的滚滚流水响，田里蝈蝈的鸣叫声。最后，我想可能要随大队长去见领导同志。如果是去见毛委员，该多好啊！

第二天天没亮，我就起床了。吃过早饭，我来到大队长住的地方。大队长今天也穿得比往常清洁整齐。他打开一个装文件、地图的小竹箱，取出一份材料坐在那里翻阅着。我看他在材料上用笔钩钩划划，有时还添上几个字。我在旁边踮着脚看，可不知道上面写的是啥意思。

大队长看完文件，高兴地对我说：

“小罗，今天带你去见毛委员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毛司令。毛委员很关心赤卫队，要我们去给他讲讲情况。”

“见毛委员！”这是我盼望好久的事了，现在就要实现了，高兴得我连蹦带跳，笑得合不上嘴。

以前我常听人讲，毛委员骑着大红马，是个百战百胜的司令员，反动派、白军都很怕他。我在心里暗想：毛委员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腰里插着两支驳壳枪，很威武。想到这里，我高兴地哼起我喜爱的歌谣：



“三湾降下北斗星，满山遍野通透明。”

“三湾来了毛司令，领导工农来翻身。”

“红旗飘飘进三湾，九陇山下闹革命。”

说实在的，那回毛委员带着队伍刚进三湾时，我和村里一起放牛砍柴的穷娃子，跑了十几里路没有见着，过后很后悔。这回大队长要带我去见毛委员，我怎能不高兴呢！我一定要把毛委员看个够！我很快收拾好大队长的东西，便随着大队长出发了。